



解放西北的最后决战

□ 张瑞安

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在西北的最大追击运动战与攻坚战相结合的战役，是解放西北的最后决战。战役的胜利，歼灭了马步芳的精锐主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盘踞西南、屏障西北、待机卷土重来的企图，大西北再无强敌。

“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二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

1949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向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发起进攻。蒋介石集团虽然败局已定，但仍不甘心失败，妄图保住西北，据守西南，以待他日卷土重来。扶眉战役后，胡宗南残部退守秦岭、汉中，马步芳部（简称青马）撤至灵台、崇信、陇县地区，马鸿逵部（简称宁马）退至长武、泾川地区。为挽回败局，二马在静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平凉会战计划，准备在平凉地区与第一野战军决战。

针对这一情况，1949年7月20日，毛泽东电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二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往

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遵照这一指示，第一野战军决定抓住有利战机，以1个兵团牵制胡宗南部，用3个兵团举行打马战役。

由于二马各怀异心，平凉会战计划随之破产。面对这一局面，国民党政府召开了西北联防会议，策划了兰州决战计划，决定由马步芳部撤至兰州，凭险据守，将第一野战军主力吸引至兰州城下，会合马鸿逵部与胡宗南部予以夹击围歼。

“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政治、军事中心，地理上又是连接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兰州城夹山带水，地势险要，东西长20公里的南山是全市的天然屏障。抗日战争时期就构筑了国防工事，后经多年增修，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马步芳将其主力几乎全部布防在兰州，并让其子第82军军长马继援亲自坐镇指挥。其部署为：第82、129军又2个骑兵师、3个保安团共5万多人据守城区，兵力重点分布在南山的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一线；第91、120军和马鸿逵部第81军共3万余人，部署在兰州东北的靖远和景泰沿黄河两岸地区，以保障兰州左翼安全，并相机侧击解放军；新编骑兵军防守于洮河、临洮地区，以保障兰州右翼安全。敌人依山夹河而阵，易守难攻。马步芳父子吹嘘“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兰州是解放大西北必取之战略要地。青马摆开架势，死守兰州，进行决战。彭德怀认为，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他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8月4日午时，彭德怀向各兵团下达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命令，拟以一部兵力钳制宁马，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马步芳部，并相机歼击增援兰州之敌。

自8月9日起，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向西挺进。右路第19兵团首先从平凉、固关等地出发，沿西兰公路向兰州方向攻击前进，先后占领华家岭、会宁、定西等地，至19日进至兰州东南25公里的定远镇以东地区，同时攻占了猪咀岭、张中店；中路第2兵团于10日从泰安地区出发，经通渭、内官营镇、新营镇，攻占榆中、洮沙等地后，于19日占领兰州城南20公里的阿干镇，按计划抵进兰州城西、城南；左路第1兵团及第62军于11日出甘谷、武山，接连解放陇西、漳县、渭源、会川等县城，歼灭国民党甘肃保安旅旅部及第8团1400余人。16日攻克临洮，迅速修复被青马破坏的洮河大桥，于20日解放康乐，并向临夏发起攻击。至20日，第一野战军完成了进攻兰州的各项战斗准备。

三路大军同时发起攻击

25日7时，第一野战军向兰州发起总攻。首先以猛烈的炮火轰击，继以爆破扫除障碍，而后向敌阵地的削壁、堡垒和层层防线实施突击。第63军一部进攻东岗

镇并在响水子沿河警戒。第65军及63军之一部进攻马家山敌第100师阵地，歼灭当面之敌后，向城关发起进攻。第6军进攻营盘岭敌第248师阵地，而后向城关发起进攻。第4军向沈家岭之狗娃山敌第190师阵地进攻，而后向城西关发起进攻。第3军向七里河进攻，并以第7师配合兄弟部队攻击狗娃山，得手后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第9师攻占七里河地区并配合第7师夺取西关，控制铁桥；第8师封锁兰新公路。西北战场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在兰州城郊展开。

沈家岭是敌主阵地，被称为“兰州锁钥”，夺取沈家岭，就等于打开了兰州的大门，可以直捣兰州西关，控制咽喉要地黄河铁桥，截断敌人唯一的西逃退路。担负沈家岭主攻任务的是第4军11师31团。战斗打响后，团长王学礼指挥2营首先发起攻击，1营随后跟进，战士们仅用10多分钟，就攻破了敌人第一道防线。接着，又用集束手榴弹投向敌群，迅速占领第二道防线。敌实施反突击，企图夺回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争夺，伤亡都很严重。王学礼将预备队第3营投入战斗，在友邻第33团的支援下，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攻，下午6时，第4军完全占领沈家岭。

皋兰州的主峰营盘岭工事坚固，第6军组成的炮兵群以猛烈的炮火支援步兵冲击。当第17师50团冲到第一道削壁时，突破口未炸开，敌人凭借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几次爆破和攻击均未成功。在该团突击队主攻营盘岭正南敌阵地的同时，第16师46团主攻东南敌军阵地。炮兵群集中火力，猛轰敌主阵地，摧毁其众多火力点，掩护第46团突击队进攻。炮火轰击后，步兵以迅猛的动作冲向敌阵地，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弯了，就空拳和敌人厮打。至17时，后续部队又突破二、三道削壁，第6军终于攻占了营盘岭。

马继援见城郊阵地一日之内相继丢失，而胡宗南、马鸿逵的援兵却不见踪影，遂对坚守兰州失去信心，最后决定于19时后趁黄昏夜幕之际从黄河铁桥秘密撤退。

与此同时，迂回到兰州西关的第3军7师19团8连迅速向黄河铁桥进攻，敌守桥部队顽强抵抗，第8连集中火力支援突击队冲击。此时，敌军大批涌上桥头，企图夺路而逃，铁桥上一片混乱，不少敌官兵落水或溺水时淹死。至26日2时，第3军攻占兰州西关，火力控制住黄河铁桥，切断了敌军退路，后迅速攻入城内，与南山溃敌展开了激烈巷战。7时占领城内主要据点，11时攻占黄河以北的白塔山。此时，第6军及其他部队也先后攻入城内。第19兵团第63、65军直插东稍门，共同消灭了城内残敌，兰州获得解放。

兰州战役是大西北解放进程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决战。负责左路作战指挥的王震说：“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次战役决战。兰州战役的胜利，对彻底消灭西北国民党反动军队，肃清全国反动残余势力，对全部解放西北五省辽阔的祖国疆土，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战争指导思想，是人民军队长期战争经验的凝练和升华，直至今日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人民军队作战经验血与火的军事智慧结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把“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视为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作战准备与战争力量优劣的转化联系在一起，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每战均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将其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第五条，指出：“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多次强调“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1958年7月27日，决策炮击金门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彻夜未眠，在上午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提出将炮击时间向后推一推，提出“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要求“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按照毛泽东这个指导思想，炮

击金门的时间又向后延了近一个月，国际形势的发展更加明朗了，我军的准备工作也更加充分了，为取得炮击的全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深刻内涵。一是作战准备要充分。毛泽东认为，对敌我双方状况的充分把握是打胜仗的基础。充分的作战准备，体现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全过程，既要摸熟己方部队，如指挥员、战斗员、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情况，也要摸熟敌方部队相应情况，还要摸熟一切和战争有关各种信息，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条件，这样去指导战争才比较有把握，比较能打胜仗。在准备时机这一重大问题上，宁可提前、不可推迟，以便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有准备要建立在有把握取胜之上。作战不但要有准备，更要有把握，“须以争取胜利为原则”，这是军事部署的根本要求。有准备而无取胜

把握，不能称其为“有准备”；有准备又有取胜把握才是真正的“有准备”。毛泽东强调，有准备而无取胜把握的仗也不能打。1932年1月，红军决定攻打三面环水、城墙高筑的赣州，并为此做了一定准备。对此，毛泽东并不同意，他认为赣州易守难攻，且敌援就在附近，因此不打为好。事后发展果如毛泽东所料，主攻的红3军团不仅没有打下赣州，还遭到严重损失。

三是有准备有把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战争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其变化趋势很难捉摸，做到绝对的胜利把握是很难的。有时准备虽然不充分，但战机成熟，取胜有把握，也要敢打必胜，以免贻误战机。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原本计划先在朝鲜北部组织防御，准备充分并摸清“联合国军”底细后再行反攻。但由于敌军在占领平壤后放胆冒进、孤军突出，我军准备虽然未就但战机已现，毛泽东果断改变原计划，在运



陈奇涵是江西兴国人，他早年投笔从戎，其后追随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屡建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及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奇涵立身严正，品行高洁，他的初心和风范成为无数后人学习的榜样。

“共产党的官当得再大，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陈奇涵青少年时期就立下救国救民之志。中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取“君子忧道不忧贫”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与同学一起创办“忧道小学”，传播爱国思想。1922年还专门为老家的祠堂写了一副对联“戡乱定中原，万国衣冠朝我族；揭竿除暴政，千秋事业著丹青”以明志。此后陈奇涵秉持为国为民的初心，戎马一生，屡建功勋。陈奇涵的家庭也为革命作出很大的牺牲，为了革命，他家房子被烧，几位亲人牺牲。但是，陈奇涵不以革命功臣自居，不让健在的亲友享受特权。陈奇涵热爱家乡，自从1934年离开江西，直到1954年去北京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前夕，他才得空回家。回家前，他未提前给地方领导和家里人打招呼，轻车简从就回到了村里。村里看到陈奇涵回来，都兴高采烈，也有亲友说要杀猪、放鞭炮，来为他接风洗尘。但是陈奇涵严肃地说：“荣归故里，接风洗尘，失道欢迎，那都是官僚老爷的作风。共产党的官当得再大，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那就会脱离群众，你们不准为我接风洗尘。”

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陈奇涵坚决不允许家里亲友搞特殊。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侄子陈毓华在南昌一家宾馆做厨师，厨艺很好。后来有人建议说“陈将军的侄子应该安排个更好的工作”。陈奇涵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认为侄子有手艺，在宾馆做

□ 彭洲飞

动中对敌实施突然攻击，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四是立足最坏处向着最好处努力作准备。毛泽东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把最坏最糟糕情况都想到，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会尽可能排除战争失败的可能性，努力争取最大的胜利。作战行动要预计各种可能性，准备多种方案，凡战争局势未定之时，必须想到各种可能情况的应对之策。

坚持慎重初战。一是必须打胜。这是初战准备的总原则。由于初战对整个战役影响巨大，直接关系到战役进展和整个战略筹划，打赢是第一要求。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格外重视初战，对战场选择、首歼目标、战术策略等都进行了精心安排，确保了初战即胜。

二是必须照顾到全战役计划。作

陈奇涵将军的初心和风范

□ 曾 辉

炊事员很合适，并说：“不能因为我是将军，我的亲友就应该受到特殊照顾。”陈毓华也理解叔父，安心厨师工作，一直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干到退休。陈毓华的四个儿子，都是普通工人，有三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也秉承陈奇涵的教诲，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国为民发光发热。

“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

陈奇涵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坚守初心和使命，向来不太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1925年2月，经陈廉、许继慎的介绍，陈奇涵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陈奇涵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不久国共两党矛盾凸显。陈奇涵当时已经是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兼军事教官，如果留在国民党，以陈奇涵的资历和能力，日后自然能加官晋爵。但是陈奇涵却称“宁愿做普通的共产党员，躬耕陇亩，也不当国民党的官”，最终选择退出国民党。在北伐前夕，陈奇涵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带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批江西籍共产党员回到江西，冒着生命危险，在兴国等县建立党组织，在赣南、赣东开展工农运动，广泛传播革命火种，被毛泽东誉为“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

陈奇涵战功赫赫，却不居功自傲，他谦虚地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说：“我对自己几十年来的总的评价是，无能事，而能无事。”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写诗明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全国齐解放，攘攘与熙熙”。当时全国大局初定，大规模抛头颅、洒热血的战争年代已经过去，进入相对安定的和平年代，一些人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陈奇涵却明确地说“富贵非吾愿”，淡泊明志。

陈奇涵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55年，人民军队为了走向现代化、正规化，在全军范围内开始评定军衔。按照当时的标准，评定上将要求具备在红军时期参与创建重要革命根据地，担任过师长、政委以上级别和职务等条件。陈奇涵完全符合上将的要求。但是，陈奇涵在

申报军衔时，却自报为“中將”，并在军衔表上写道：“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评定军衔，对军人来说，意味着对过去功绩的承认和肯定，也意味着军人的荣誉和地位。因此，在评定过程中，一些名利心较重的军官因为没有评上如意的军衔，难免不平 and 抱怨。反观之下，陈奇涵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陈奇涵不居功，也不恋位。他听从组织安排，担任首任全军军事法庭庭长，一手领导创建军队军法组织系统，进行军事刑罚立法等奠基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完成后，陈奇涵功成身退，经再三请求，主动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开始从事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整理历史资料，回忆总结历史经验等工作。

“高级泥瓦匠”

陈奇涵之所以受世人尊敬，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向来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趋炎附势，不落井下石，一生光明磊落，与人为善。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受到排挤，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是陈奇涵却并不因为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而对他的态度产生变化。陈奇涵认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依然尊敬毛泽东，反对不切实际的“左”倾路线。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陈奇涵并未随声附和，而是坚持原则，因此受到打击。1934年春，陈奇涵从军区参谋长降为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部长，后来又背着“黑锅”随军长征，但陈奇涵从不后悔。他不骑墙摇摆，虽受打击迫害，仍坚持原则的精神品格由此可见。

陈奇涵这一精神品质一以贯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是中央党校第三支部书记，对一位犯过错误的陕北领导干部做的历史结论，写得客观公正，使这位同志终生不忘。“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奇涵被派往高等军事学院任军管会主任。他旗帜鲜明地宣布：“谁搞派性，搞武斗，我都坚决反对，不管是谁支持的。”有人就贴大字报说“陈奇涵是和稀泥的”。陈奇涵坚定地回答：“说得好，我陈奇涵就是高级泥瓦匠。”其间陈奇涵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保护战友，维护党的团结和稳定。

弱、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主力决战，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应该坚决避免这种赌国家和军队命运的决战，“不到决战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抗日战争前期，日本侵略军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找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妄图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侵占全中国的目标。针对敌强我弱、敌人妄图胜利的形势，毛泽东提出：“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特别是战略决战必须避免，战役战斗的决战也应本着有把握的原则进行，使日本侵略者的速决梦破灭了。

对有利决战，坚决执行。毛泽东强调，“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一旦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或是力量对比相差不大甚至敌方略有优势但我方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决战的时机就来到了，要坚决地去执行有利决战，消灭敌人主力赢得战争胜利。

